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严复



严复

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四大代表（另三个为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之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少年时代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于1854年。他的家庭在当地是一个中等人家。祖父曾经中过举，并在县里做过小官（训导），但最终却以精通岐黄之术，行医乡里，以悬壶济世，而维持一家生计。父亲严振先，继承祖业，是乡间的一位普通医生。当严复来到人世的时候，他的家庭虽不算富庶，却也是能维持温饱的小康之家。

然而，就在严复14岁的那一年，父亲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两个妹妹和他本人。一家4口，全赖母亲作女工来维持生计。后来，严复在一首诗中曾回忆当时的生活说：“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贖钱不充债……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骨，下养女儿大。富贫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生活的艰辛，由此可以想见。

父亲的去世，不仅使他的家庭失去了生活依靠，而且也使得严复无法像一般的富家子弟那样，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当时，洋务派人物左宗棠和沈葆楨等人，在福州创办了造船厂。为了培养造船和驭船人才，又设立了“船政学堂”。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考入该学堂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3个月考试1次，如果成绩优等，还可得赏银10元；5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政府中得到一份差事，而且还可以参照从外国聘请来的职工待遇标准，优给薪水。

船政学堂的这些优待条件，对当时一般的富家子弟来讲，是看不上眼的。因为，他们家大业大，因而把科举视为正途，一心一意想从秀才、举人、进士，而步入公卿行列。而船政学堂学的大都是“洋务”，这在当时是被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然而，对于像严复这样的家庭来讲，船政学堂的这些条件，则是很有吸引力的。故而，当它在1866年冬天正式对外招生时，福建和广东一带的许多贫家子弟，都前来报考。13岁的严复也正是这些前来应考学生中的一员。

揭榜了，严复得了第一名。这对于刚刚失去父亲的家庭来讲，当然是一个特大的喜讯。14岁那年，他正式进入该校学习。

当时的船政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重点。故而，这里的课程设置中虽然也有“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文理”等内容，但最主要的还是以造船和驭船的相关科学技术为主。在这里，严复系统地学习了外语、算术、几何、代数、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光学、电学、电磁学、声学和热学等课程。这些都是当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知识、新学问，与严复此前在私塾中所学的四书、五经等绝然不同。求知的欲望，再加上少年时代的好奇心，使他对这些课程非常感兴趣，学习成绩也因此一直名列前茅。

19岁那年，严复从船政学堂毕业。由于终考的成绩为最优等，他因此为洋务官员沈葆楨和有关教席所器重。毕业之后，他马上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是随“建威”号船南下新加坡、檳榔屿等地，再北至中国东部海面的渤海湾和北部的辽东湾等地。次年，福州造船厂又成功地自制“扬武”等5艘兵船，他被改派到“扬武”号船上，巡历中国的黄海及日本各地。

二、留学英国

1877年，严复结束了长达5年的随船实习生活，前往英国留学。根据当时洋务官员的理解，在西方各国中，法国的造船技术最精，而英国的驭船术最良。根据这种理解，他们把在船政学堂读书的生童分成二个班：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造船之术，以培养“良工”；后学堂学习驭船之术，以培养“良将”。由于严复此前所学的是驭船术，也就是说，他是被当作“良将”来培养的，故而被派往英国留学。

来到英国后，严复先进普茨茅斯（Portsmouth）大学学习。肄业后，又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学习。在这里，他所学习的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技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诸学。经过考试，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屡列优等”。

严复留学英国之时，也正是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之日。当时，除了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宰割之外，北方的俄国和东面的日本，也不时窥测中国。东西列强对中国的纷纷宰割，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这些都深深地刺激着严复。正因为如此，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并不满足于课堂的教学。每每于课余之时，或茶前饭后，他还对西方的政治学说以及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备加关注。当时，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的强盛是首屈一指的。严复希望通过对英国政治制度、经济运作以及思想家们政治学说的观察、分析、研究，来探讨其强盛之由，进而为中国的出路，提供良策。

年轻的严复，凭着自己对英国社会的亲身观感、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一些虽然朦胧、但却又十分执着的想法，逐渐在他的脑际产生。原先，对于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言论，他是十分信从的。他们认为，西方比中国高明的地方，仅在于其“坚船利炮”，至于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中国则比西方强得多。因此，所谓“洋务”，主要就是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未经沧海的严复，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通过在英国的实际观察，他开始对洋务派的这一套主张，产生了怀疑。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曾谈到：“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可见，通过对英国社会的切身感受，他已经感到英国的富强并不是如洋务派官僚们所说的，仅仅在于其“坚船利炮”，而在于其有一个使“公理日伸”的政治和立法制度。

通过对英国社会的进一步了解，严复更是眼界大开。他发觉，在偌大的英国，一切治理得井井有条，“莫不极治缮葺完”，给人以一种安定、富足之感，反观中国，动乱不止，饥民遍野。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他已朦朦胧胧地觉得，中国与英国之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象，关键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他认为。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谋国者，以箝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因此上下不会一心，政治也因此而难办；但在西方国家，“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由于上下不会一心，平民百姓都是当政者的“苦力”，在西方国家，由于上下一心，普通百姓也是“爱国者”，“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处处落后、时时挨打，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及

其学说主张，纷至沓来。除了早期的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说之外，边沁的功利主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实证论哲学和逻辑学，等等，都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此时更是风行一时。严复到英国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已20多年。根据进化论原理所开展的人类起源和生物进化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所有这些，都给人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思想学说，严复感到新鲜而且好奇。他觉得，英国思想家们的这些思想学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训”或辞章，重观察、轻推理，很能切合实际。因此，他便开始大量的阅读和钻研。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法国，此时也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早期的启蒙运动和后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法国许多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已广为人知。由于法国在大革命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因此，这里的思想学说，与英国相比，又是另外一种景象。特别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等观点。长期生活在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下的严复，初次接触他们的思想，更觉耳目一新。为了探究其思想要义，他甚至还亲自去法国游历，以考察这些思想家们的生平经历，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脉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揣摩，他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基本上都有所了解。这些对他后来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曾具有巨大的影响。

在英国期间，严复还与当时清政府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时常来往。每逢周末或假期，他总是到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郭嵩焘在当时的洋务派官僚中，是一位对西方各国了解较多、思想也较为开明的人物。由于严复对“西学”了解甚详，见解精辟，能发人所未发，从而得到他的赞许与赏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郭嵩焘一直把严复引为忘年交，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任！”从郭嵩焘对严复的赞许中，我们可以看出，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了解，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

三、任职北洋水师学堂

1879年6月，严复结束了在英国两年多的留学生涯，毕业回国。当时，福州的船政学堂正需要像他这样了解西方各国情况、稔熟西学的教师。于是，他一回国，就被洋务派官员聘为该学堂的后学堂教习。

次年，另一个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在天津又另外开办了一个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此时，福州造船厂的创办人左宗棠和沈葆楨，一个调离原职（左宗棠），另有它任，一个则已逝世（沈葆楨）。故而，清政府全部海军的势力都逐渐集中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里。为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水师学堂的同时，还注意网罗精通洋务、熟悉西学的人才。长期以来一直为沈葆楨、郭嵩焘等人所赏识的严复，也成了他重点网罗的对象。

就这样，严复在担任船政学堂的教习之职1年后，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出任总教习（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从此，严复在这里任事长达20多年，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才离开这个学校。

来到北洋水师学堂之后，严复才发现，这里与福州船政学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里也分驾驶和管轮（或称轮机）二个专业，但却不同于船政学堂的造船与驭船并重，相对而言，这里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海军学校。当时的北洋水师学堂，设在天津城东不远的机器制造局旁边。由于李鸿章想借这里培植自己派系的亲信和骨干，故而，这里的校舍修建得十分宽敞，而且楼台掩映，花水参差，景色十分宜人。

在该校总教习的这个位子上，严复一干就是9年。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一般要由候补道等级的官僚出任。严复不是从“正规”的科举之途走出来的，虽然他留过学，而且谙熟西学。但是，在资格上却只是武职都司。因此，他一直行总办之责，但却无总办之名。

37岁那年，严复连捐带保，总算有了一个“选用知府”的官衔。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李鸿章升为该校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次年，正式升为总办。稍后，他又由选用知府升为选用道员。就这样，他开始以一个四品官衔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身份，慢慢地为京、津一带的官僚所熟悉。

不过，对于饱读西学新知、立志从西学新知中来寻找国家和民族出路的严复来讲，对自己的四品官衔身份和北洋水师总办之职，是不尽满意的。当时，清政府对洋务的尝试，已经露出了败迹。在1883年至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特别是在福建沿海的海战中，法国海军几乎将福州的造船厂夷为平地。面对清政府在外强压境之时的腐败不堪。特别是对于当时中国海军内的腐败情形，严复十分不满。他认为，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洋务，依然充满着官场的腐朽习气，名为“中兴”，实则一塌糊涂。他甚至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不出30年，中国的领土将被列强吞食殆尽，那时候中国就要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了！这种激烈的爱国优时言论，不仅使在场的人们听得心惊肉跳，而且更使得李鸿章等一班洋务大员很不高兴。

几乎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明治维新。短短时间内，日本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国力蒸蒸日上，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强国。日本与中国一正一反的现实。使得严复更加深

信，洋务事业不可能救中国，更不可能使中国复兴。正因为如此，身在洋务派官僚所办水师学堂中任职的严复，却不时地对洋务派的举措发出批评。这样，原来对他比较器重的洋务派官僚，开始日益与他疏远。在当时的一封家书中，他写道：“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更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置之不足道也。”他这种“公事更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的处境，显然与李鸿章等人对他的冷淡有直接的关系。后来，陈宝箴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也说。“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为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可见，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严复虽然有总办之名，但却一直没有得到李鸿章的重用。与他同一时期留学的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人，此时早已在海军中任舰长等要职，只有他空守着天津的这个海军学校，“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之所以如此，与他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洋务政策是大有关联的。

由于在北洋水师学堂处处受制于人，根本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故而，严复准备另谋发展。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曾一度与人在河南合办煤矿。但是，这种私人性质的资本主义企业，并不能帮助他实现救国家于危难的政治抱负。万般无奈之下，他对自己的生平所学产生了怀疑：“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他想，如果自己当年不入福州船政学堂，不学习西洋近代科技文化，而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士人一样，走科举入仕的道路，那么处境或许就不会如此艰难了。想到这里，他似乎恍然大悟：自己还年轻，反过头来再通过科举考试，也应该来得及。于是，他便决定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条路怎么也走不通。1885年，他在自己三十多岁的时候，参加了福建的乡试；36岁至37岁的时候，曾两次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直到40岁时，他又参加了福建的乡试。结果，都没有考中。

如果没有甲午中日战争的发生，严复或许还会有第五、第六次的科举考试，这样，他也许会沿着科举这条道路，由举人而进士，以至于平步青云，位列公卿。然而，就在他企图以科举考试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时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最终以中国失败而告结束。自此，中国的形势更加危急，为执着于自己人生理想而在科场中连年奋斗的严复，在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下，也终于清醒过来。他感到再也不能流连科场了，应该与全国的爱国志士一道，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洪流之中。

四、为救亡图存而摇旗呐喊

中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后来曾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的确，以甲午战争失败为契机，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战争结束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从而彻底地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亡国灭种的惨祸，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开始拍案而起。他们起而言，言而行，呼吁改良，倡导变法。于是，一场以变革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为中心，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在千回百转之后，汇成时潮，蔚然兴起。而严复则正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如果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这场维新变法的运动中，主要是以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姿态出现，那么，严复在这场运动中则主要是以维新派的思想家身份出现。他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传播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多篇政论性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内容，基本上与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相同，即鼓吹维新，反对封建专制。但是，从立论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特别是理论体系等方面来看，又不尽相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全都是旧式的封建教育，他们没有去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又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从而也不能直接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有关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方面的著作。因此，他们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时，主要是以中国的旧学为武器，如康有为在鼓吹变法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基本上就是从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场，来论述维新的重要性，并把孔子改头换面，打扮成维新变法的首倡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往往互相矛盾，整个理论也常常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本人也是承认的。

与他们相比，严复则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径。他没有系统地接受中国的教育，少年时代即在船政学堂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稍后，又留学英国，醉心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典章文物，阅读了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卢梭和达尔文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大量理论著作。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就严复对西学的造诣之深和对于西方社会的实际了解来讲，不仅远非李鸿章、张之洞和郭嵩焘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即使是曾经到过国外的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也正因为如此，同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同是倡导变法维新，严复所用的武器则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对于近代的中国社会来讲，严复所运用的这一理论不仅是全新的，而且也是更富战斗力的。

在前述严复的几篇重要政论性文章中，《论世变之亟》是他阐述自己维新思想的一个引论。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封建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来批判顽固派的迂腐。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运会”。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于“知

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裁成相辅，而置天下于至安”。他还郑重指出：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是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世变”。所以，他认为，绝不能幻想阻止这个“天地已发之机”，而只能在承认这个总形势的基础上，讲求救国自强之法，使中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富强，才有办法。他说，顽固派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叫嚣，其目的是将封建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妄想“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似乎只要这样，世界从此便可太平无事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他进而批判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睹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可以自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

在批判了顽固派的言论之后，他又在《原强》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救国理论。他根据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该国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和“德行仁义之强”——即力、智、德三者的高下。他说：“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根据这三个标准，他进而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他认为，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政治腐朽已到了极点。他说，当时的中国“将不素学，士不素材，器不素储，一旦有事，则……转以奉敌”；至于各级官吏，“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他指出，常此以往，则“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

既然中国在“力”、“智”和“德”三个方面都不如别人，那么中国是不是还有希望呢？他认为，希望还是有的，关键在于自己能否与时并进，百尺竿头，发愤自励。他根据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学说，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也就是说，中国虽然目前在力、智和德三个方面不如别人，但可以通过努力，迎头赶上。因此，对于中国来讲，要想谋求国家的富强，就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正因为如此，他大声疾呼，要求进行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

那么，怎样才能救亡图存，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呢？他认为，主要的办法有三个：“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和禁止妇女缠足，以强化人民体质。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时文，提倡西学，以提高人民的智力。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弟子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相反，中国的传统学术，“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因此他主张：“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至于“兴民德”，最主要的就是创立议院。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把人当奴隶。他说：“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

欤？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可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西方各国则不然，他们法令制于议院，人们都遵守政府的法令。“各奉其自主之约”，从而上下一心，“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通过中国与西方的这种尖锐对比，他主张：“居今之日，欲进吾民德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严复的所谓“新民德”，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

《救亡决论》是《原强》一文的补充。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就开民智一事，痛快淋漓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旧学和八股取士的危害性，进一步指出了西学输入的重要性。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然则救之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如果废除八股，讲求西学，则必能致国家于富强。

与前面几篇文章相比，《辟韩》一文则集中地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严复认为，唐代韩愈所写的《原道》一文，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渊藪，也是中国专制政治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在他看来，韩愈此文，“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人民。他认为，“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们都是窃国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而韩愈却把这些看作是“天之意、道之原”。因此，他据此发问：这种窃国于国的行径，难道“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固如是乎？”该文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主的一篇战斗檄文，而且也是严复一生中最为足以说明他是时代先进者的一篇重要文章。

在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约”理论出发，他指出：“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也。”也就是说，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是人类分工的产物，耕者、织者、工者和贾者，之所以要养活为政者，是要他们“卫其性命财产”，而不是要他们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

1895年3月，李鸿章前往日本，准备接受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和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严复深感形势危急，于是又在该月月底发表了《原强续篇》一文。在这篇战斗性论文中，他呼吁与日本继续作战，反对签署卖国条约。他公开指出，李鸿章之流“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今日北洋之糜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他反复强调一战到底，认为“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这篇文章不仅痛斥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而且还洋溢着作者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五、惊世骇俗的《天演论》

按照严复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逻辑，要救亡图存，就要进行变法，而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开始。所有这些方面，都离不开报纸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故而，从1896年开始，他就积极赞助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他自己发表的《辟韩》等论文，也在《时务报》上转载。为了贯彻自己的开民智和新民德主张，1897年11月，他与王修植、夏尊佑等人，在天津正式创办《国闻报》。该报是一份日报，每天出八开新闻纸一张，登载国内外的时事，并经常发表社论。稿件来源，除了选择百余种国外报刊外，还派人到各地实地采访。除日报外，他们还另编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

严复创办《国闻报》的宗旨是：“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思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策，而吾国强。”也就是说，他创办该报的目的有两个方面：其一，通上下之情，让大家发挥人人的聪明才智，合而成为一国的才智，以达到开民智和新民德的目的；其二，通中外之情，以了解国外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风俗，使中国的统治者“不自私其治”，进而能学习西方的“民主”，以自求自强，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严复等人创办的《国闻报》，是最重要的一份报纸。

该报创刊不及一月，便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当时德国强占胶州湾，而中国的守军未经抵抗，就退了出来。严复闻讯后，当即在该报上撰文予以抨击。对德国的侵略行径，他认为是“盗贼野蛮”；至于清朝政府的文武官员不作抵抗，他更是斥之为无耻。他还就此事横感慨议论，认为“中国官兵，大都奢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他进而指出，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因此，要革除这种腐朽的政治，除变法之外，别无它途。

类似以上的例子，在《国闻报》中可谓不胜枚举。由于严复善于从一些具体的现实事件入手，由现象及本质，以此来揭露清政府在政治举措和科举制度等方面的黑暗与腐朽，从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1895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稍后创办的《国闻报》，严复成为全国关注的风云人物。不过，当时影响最大，也就是使他最负盛名的，则是他翻译的那本惊世骇俗的《天演论》。

《天演论》一书，是严复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这本论文集翻译出来的。早在英国留学时期，严复就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进行过探讨。特别是对于赫胥黎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所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十分倾服笃信。回国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备受中国战败的刺激，遂开始从事于该书的翻译。《国闻报》创刊之后，曾陆续发表过《天演论》一书的有关章节。1898年4月，该书正式出版面世。

《天演论》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也”；而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与自

然选择，“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这样，“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恩格斯曾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将其视之为近代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性发现。进化论学说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界万物生长、优胜劣汰的原因及其规律。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勇敢捍卫者。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自然界遵循“物竞”和“天择”的原则，没有什么道德标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而人类则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一个可称为伦理的过程。”正是由于这种天性，人类才不同于动物，社会才不同于自然，伦理学才不同于进化论。这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基本观点。

但是，严复则不同意赫胥黎的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观点。在《天演论》一书的众多按语中，他对赫胥黎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类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互助，团结以“保群”，这些都是“天演”（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末”而不是“本”。人就其本质来讲，与禽兽万物一样，之所以“由散入群”，形成社会，完全是由于彼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开始人就有与动物完全不同的同情心、“天良”和“善相感通”。因此，生物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格局。在这一竞争格局中，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否则，就要亡国灭种。根据这一观点，他认为，欧洲国家之所以能侵略中国，就在于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自己的“德、智、力”以争胜。因此，中国人别再妄自尊大，谈什么空洞的“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而被侵略的中国则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愿意做亡国奴呢？还是愿意力争自己的生存呢？我们应该有所决择！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他翻译的《天演论》，只是重点选择原书中有关万物进化的部分进行翻译，至于‘赫胥黎讲述社会伦理的部分，则基本上不予翻译。“天演论”这一书名，也只是赫胥黎原书名的一半。

《天演论》一书用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比无已的客观规律，以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给当时的中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书中那“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呐喊，无疑为中国人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从而为煽起人们的爱国热情，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书中那慷慨激昂的言论，即使是吴汝纶这样的封建士大夫，也备受浸染。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吴汝纶就对该书备加赞赏：“前读《天演论》，以赫胥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释手。”至于当时维新派的许多重要人物，更是对它赞不绝口。梁启超是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该书尚未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据此写文章、发议论，宣传“物竞天择”的理论。康有为向来是目空一切的，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也谓“眼中未见此等人”，认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严复的有关思想虽不完全同意，特别是对他翻译的《社会

通论》等著作还持反对意见，但对其所译《天演论》一书，则备加尊重，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一文中，就曾公正地指出：“自严氏之书（即《天演论》）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然而，《天演论》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人们读《天演论》，不只是获得了一些新鲜知识，也不只是获得了对某些问题甚至是救亡图存之类大问题的具体解答。更为独特的是，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晚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迅速瓦解、崩溃，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迅速涌现，严复翻译和介绍过来的这种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好符合他们踢开封建羁绊，蔑视传统权威，强健身体与自然界斗争，走进人生战场，依靠自己力量去闯出人生道路来的需要。而这种观点和态度，又是以所谓“科学”为依据和基础，从而更增强了信奉它的人们的自信心和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自《天演论》出版后，数十年间，“自立”、“自强”、“自力”、“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和“演存”、“进化”、“进步”等词汇盛行不衰，并不断地、广泛地被人们取作自己或子弟的名字或学校的名字。在今天的中国老人中，此类名号都还有不少。这就深刻地反映了严复给好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一种非常合乎他们需要的发奋自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天演论》的独创性之所在，也是这本书及其思想长久风行、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然，用“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这本身是不科学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天演论》和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后，其社会影响也就随之消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和远远超过了《天演论》的影响、作用和地位。

六、在维新变法运动中

甲午战争之后，严复虽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维新派思想家，但是，在稍后的百日维新运动中，他却并没有直接参加。自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的3年中，他自始至终守着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职位，他的活动区域也主要以天津为限，只是偶尔到过北京几次。

严复之所以没有积极参加当时康有为等人的百日维新活动，是因为严复的思想，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都主张走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中国的变法改良虽然千头万绪，但却有一个中心，即从政治改良入手，即通过皇帝自上而下的变法，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使中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在严复的心目中，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也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政治制度，他与康有为等人则有着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要想使中国成为一个英国式的民主国家，当下最主要的任务，不是从改良政治开始，而只能从“开民智”和“新民德”的教育入手。在1895年写作的《原强》一文中，他曾主张：“居之今日，……设议院于京师。”但是，当第二年梁启超写信给他说要将此文转载于《时务报》时，他则表示自己对这篇文章不尽满意，准备修改以后，再给对方寄去。从后来《时务报》所载的《原强》一文来看，他早先的“开议院”主张，则被删去了。直到1902年，他在《原富》一书的有关按语中还说：“今日中国言变法者，……动欲国家之立议院，……于国事究何裨乎？”明确表示不同意通过设议院等来进行政治改良。在当时与梁启超等人的辩论中，他认为，变法是一种极其艰巨的事，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因此必须从“民力”、“民智”和“民德”等基础工作入手，而在这三者之中，又在“民智为最隐”，因此应该从教育开始，先做开发“民智”的工作，经过如此这般之后，才能谈得上政治改革。正因为如此，当康有为等人积极为变法而奔波的时候，严复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而没有积极参与。

1896年，清政府曾命严复在天津创办一个俄文馆，并任总办。该馆以培养俄文人才为重点，其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其它许多工作，都是严复亲自筹办的。

同年，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这是一个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的机构，学生约有四、五十人，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在京的官僚。对于这个学堂，严复曾帮过很多忙。该校教员两人，分别教授英文和数学，其中的一人就是严复的本族侄子，校名“通艺”二字，也是严复代取的。1898年，严复还应该校的邀请，两次为这里的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这年九月，应光绪皇帝的召见，严复前往北京，也就住在该学堂内。召见后，他又回到这个学堂，为这里的学生“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源”。消息传开后，“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有闻其论者，退而语人云：西人之精义妙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别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总之，严复在通艺学堂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百日维新开始后，以康有为为首的新党掌握了政权。由于严复长期以来

出色的理论工作，新党极力推荐他出山。当时的詹事府詹事王锡蕃就曾向光绪皇帝极力推荐过严复。他说，严复是一个“通达时务”的人才，国家应该“量才器使”。在推荐的按语中，王锡蕃还就严复的相关情况向光绪皇帝作了详细的说明：“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悉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就这样，光绪皇帝才叫严复来京觐见，严复于是到了北京。

在严复觐见光绪的过程中，光绪曾命他将此前发表在《国闻报》上的《上今上皇帝万言书》呈上。但这篇万言书后来并没有送到光绪那里，因为召见后的一个星期，政变就发生了，光绪成了后党的阶下囚，严复也连忙返回天津去了。

严复所写的“‘万言书’”，从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片段来讲，主要是阐述他自己的变法主张。这一主张分“治标”与“治本”两个部分。治标方面，第一是“联合各国之欢”，他建议光绪巡游西方各国，考察他们的政治风俗，并和他们的首脑人物“联欢”，宣示中国的维新主张，这样使他们耳目一新，对中国的野心也就自然消弥了。第二是“结百姓之好”，他建议光绪，从各国“联欢”回来后，就应该到国内各地巡游，了解国内的民生利弊，从而破除过去主尊于上、民贱于下的弊病，激发人们的爱国爱君热情。第三是“破把持之局”，因为在变法过程中，自然会有许多人想侥幸以取得功名富贵，对此必须预先防止。他认为，在变法尚未正式付诸实施之前，上述三个方面，应首先予以实行。

与治标相对应的，就是治本。他所说的治本，主要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废除科举、考据、词章、义理、心性等空洞之学，使农、工、商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以此来储备人才，开发民智，使政治改革一步一步走向深入，并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以上就是严复在百日维新运动中的全部实际活动。由于他主要是以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以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当时的维新变法过程中，而且在百日维新的全过程里，他始终未担任过一官半职（百日维新时，曾设立京师大学堂，原准备请严复任总教习，后因旧党反对而未成），故而在后来的戊戌政变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或逃亡，或被杀，而他则安然无事。

七、思想理论界的巨人

与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相比，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主张及其政治实践，是暧昧而且保守的。虽然在他的内心深处，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一直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一涉及现实的政治变革，他则变得暧昧而且保守。他不同意康有为等人的维新主张，也没有积极地参与当时的维新实践，这与他这一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有密切关系的。

然而，如果说在戊戌维新的政治实践中，严复只是一个矮子，那么与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相背反，他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则表明他是当时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巨人。他的这些思想，代表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所走到的崭新阶段，并给当时的中国人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不只是在戊戌时期对改良派，更主要、也更突出的是对以后几代青年爱国者和革命者，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与同一时期康有力和梁启超等人相比，严复的思想是独具特色，而且自成体系的。他以进化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系统的资产阶级历史观，以唯物论的经验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都是发前人或他人所未发的。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不仅是最先进的，而且也是最富战斗力的。

自从林则徐主纂《四洲志》和《华事夷言》以及魏源编写大部头的《海国图志》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踏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千辛万苦的艰难历程，到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这一过程持续了80年。在这个艰难而且曲折的过程中，前后又经历了好几个重要的阶段。以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标志，正式开始了这一过程。稍后，像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郑观应《盛世危言》为代表，提出向西方学经济、学政治，主张“藏富于民”、“开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是一个阶段。到90年代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创造性地提出一套资产阶级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又是一个阶段。它们分别代表向西方寻找真理过程中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这么一条“天路历程”中不断上升的几个界碑。但是，郑观应等人提出来的只是几条具体的政策措施，至于这些政策措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亦即西方资本主义种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实质是什么，人们还是十分茫然。当时所能读到的西学书籍，不过是一些《汽机问答》、《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之类，从这些译作中得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正是有感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理论的总体指导，才“于此种学问饥荒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写了一些理论性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混合着一大堆从孔孟、陆王到唯识、华严的封建杂烩，“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且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薄，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梁启超后来的这段评价，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因此，无论是康有为装在“公羊三世”说套子里的历史变易思想，或者是谭嗣同在《仁学》里所提出的人权等政治口号，都半是荒唐，半是肤浅，“拉杂失伦，几同梦寐”，没有多少科学性和说服力，不能适应和满足愈来愈多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

的要求。

要从根本上了解西方，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些都是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向相联系的。了解并向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介绍这一世界发展趋向，已经日益成为当时的迫切课题。不是别人，而正是严复，自觉地担负起时代所提出的这一个历史重任。他以进化论为基础所提出的一整套社会历史哲学，以唯物论的经验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正是他为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中的重要部分。

关于严复以进化论为基础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观，前文在讨论《天演论》一书时，已作了介绍。这里重点谈谈后面两个问题。

其一，以唯物论的经验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如果说《天演论》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和世界观，对于严复本人来讲，并不一定是一件很自觉的事；但是，从西方的思想家如培根、洛克和约翰·穆勒等人那里，搬来资产阶级唯物论的经验论以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以此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则是他十分重视、也非常自觉的工作。严复在其全部理论工作的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哲学的认识论，并从哲学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考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整个问题。他明确认定，认识论是关键部分。这也是严复的整个思想不同于他人之处的一个很突出的地方。

严复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的看法，认为中西学术的差异，不在于虚实，“中国虚矣，其西洋尤虚”。西方所以坚船利炮，国力富强，经济政治制度所以比封建中国精良优越，正在于它们有近代以来的各种基本理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基础和依据，而它们所以有这些新科学，又正在于它们都以新的认识论——逻辑学（即严复所说的“名学”）为指导。这种认识论，就是以培根开其端的经验论和归纳法。他说：“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则无所往而不荒虚，”故而西方“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瓦特）；用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原理）。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摧陷廓清之功（归纳法）为称首。”严复把西方的富强，归之于科技，而科技之本，又在于其方法论，即培根所提出来的哲学经验论和归纳法。他称之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是指一切科学技术必需从观察事物的实际经验出发，“其为学术，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也就是说，不是书本，而是实际经验，才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检验的标准。因此，“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所谓“内籀”，是相对于“外籀”（演绎）而形成的归纳，它是以上认识论具体采用的逻辑方法。他认为，一切科学真理必须通过归纳法而设立，“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为不易”。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学”而发的。他将“西学”与“中学”作了一番比较。在他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八股、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以及辞章、书法、金石等等“旧学”或“中学”，“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

严复认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学术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不从客观事实观

察、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演绎的前提来自自己的主观臆造或古旧陈说，是“师心自用”的先验产物。“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因此，这些学问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则墨守陈规，推论过程即使不错，但前提却完全错了，“原之既非，虽不畔外籀终属无益也”。

与康有为等人欣赏陆九渊和王阳明不同，严复用唯物论的经验论，着重批判了以陆王心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认为，陆王心学的“良知、良能诸说，皆洛克、穆勒之所屏”，一切真理都由归纳经验而来，没有什么“良知”，“公例无往不由内籀，……无所谓良知者矣”。

总之，在严复看来，只从传统的“古训”和教条出发，“不实验于事物”，才是中学不如西学的根本所在。他说，“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这种教条主义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必须予以打倒和废除。必须从实际经验出发，观察、归纳、综合，才能得到“无往而不信”的科学“公例”，即普遍的原理和原则。掌握了这些公例，才可以普遍运用，驾御各种纷繁的事物及其变化。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得出原则性的“公例”，然后再普遍运用，这就是严复所要大力提倡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他认为，这才是中国所应向西方学习的根本。

严复从这样的高度来重视认识论，自觉地介绍西方近代的经验论和归纳法，就其眼光和实际达到的水平来讲，在当时的确是凤毛麟角，极为难得。这一点，使他超过了前前后后的许多人，这也是他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新学，反对中国封建旧学中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他所提倡的这一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无疑对后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种哲学上的经验论最终必然要走进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西方，继培根和洛克之后，便有巴克莱和休谟。而严复十分敬佩的约翰·穆勒，正是继承巴克莱、休谟的不可知论者和实证论者。受他们的影响，严复后来在哲学上的归宿，也正是这样。由于片面强调感觉经验，轻视理论思辨，迷信归纳万能，严复终于完全投入实证主义。在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看法上，他不断把西方的巴克莱、斯宾塞与中国的庄子、孟子以及《周易》甚至佛学和老子等，拉在一起，认为事物的最终本质、实体，是不可知的，而且也是无需认识的。因为它们于国计民生没有什么用处，可以不去管它。哲学的本体论如此，认识论也是一样。所以他主张，“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本，不得径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这种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必然影响到其政治思想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他之所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没有积极参加，而是关起门来，纯粹从自己的感觉经验出发，认为中国人的“力”、“智”和“德”都很落后，因此没有实行政治变革的现实基础，与他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有关系的。

其二，“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自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展以来，除了少数的封建顽固派之外，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即一般所说的坚船利炮），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的一致意见。但是，在这些科学技术之外，西方还有没有什么可供中国人学习？换句话说，除了科学技术之外，中国还能不能够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呢？当时，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派是以早

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西学”之中，有“体”有“用”，坚船利炮，只是西学中的“用”，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等，则是西学中的“体”，因此，要想使中国富强，就应该学习西方的“体”，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另一派则以洋务派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后来的张之洞等人为代表，认为坚船利炮是西方富强的根本，从而提出了以西方的近代科技来保卫中国封建社会的“中体西用”论。

严复无疑是继承了早期改良主义者们的思想，但又有着重大的发展。他认为，洋务派所主张的“中体西用”，完全是“逞臆为谈”的谬妄之说。在《天演论》的译序中，他说：“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披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他这里所说的“一二巨子”，显然是针对洋务派有关人物而来的。在他看来，“体”与“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部分都是完整的统一体，它们的功能（用）与其存在（体）是不能分开的，因此，“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要“合而为一物”，把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体”，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相联系，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够行得通了。严复举例说，以前中国没有枪炮，现在买来了枪炮；中国的城市以前没有警察，现在设有警察，但是，所有这些，就能解决问题，使中国富强了吗？他认为：“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舍本而逐末，中国当然不会富强。

那么，什么是西方国家的“体”呢？当时，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把西方的民主政治作为“体”。严复自己也是主张资本主义的民主或民权的，所以他才猛烈地批判韩愈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论，认为“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命脉所在。

然而，严复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这一表层，而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在他看来，民主还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民主不过是“用”而已。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害怕和最为反对的，也正是“自由”。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得自由者，乃为全爱。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又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因此，他主张：“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严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不仅远比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深刻，就是同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他站在中国近代以来正在产生和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全新立场上，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政治、经济以及所谓“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并且指出，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也是自由的产物。他的这一思想，与同一时期谭嗣同的“平等”以及康有为的“博爱”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反专制的最强音。

当然，严复所主张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他从总结人类（主

要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这一点上得出来的结论。所以,后来的革命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太炎曾说他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所谓“总相”,正是指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的一种必然规律,而“别相”则是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于一旦深入到中国的这一“别相”,严复的这一先进的理论,则立刻显得苍白而又无力。在关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抉择中,与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相比,严复要慎重和保守得多。他认为,对中国来讲,根本的问题是教育,只有每个人都能自强自治,然后才能谈得上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国家才能富强。因此,他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总观点和总方案是,强调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由教育决定的,变法改革首先在于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教育。这就比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要求立即改革政治制度要远为落后了。

八、潜心于西学著作的翻译

尽管严复不同意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变法改良运动，变法失败后，他也没有被清政府所追究，但是，戊戌政变的发生，还是深深地刺激着他。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杀以及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流亡海外，使他感到无限的悲愤。他在当时的一首诗中写道：“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表示出他对六君子被害和光绪被囚称病的愤懑。

戊戌政变后，严复回到天津，继续做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但是，以前那种“奉公之仆，闭户寡合”的安静生活不复存在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直隶一带的反帝爱国斗争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离开北洋水师学堂，自天津来到上海。从此，“水师学堂去不复收”，他也正式脱离了工作达18年之久的海军界。

此时的严复，虽然只是50岁不到的中年，但是，他自己却感到“年鬓亦垂垂老矣”，对个人的前途，感到十分渺茫。来到上海后，他曾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并非自愿的被动之举。他曾开办学会于上海，专门讲授西方的逻辑学。1900年7月，曾计划在长江两岸起兵“勤王”的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自任总干事，宣布“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并准备在武汉再次发动“勤王讨贼”。由于严复在此前已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故而被推为中国国会的副会长，正会长一职由容闳担任。

次年，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邀严复赴天津，以主持该矿事宜。但是，当他来到天津后才得知，早在八国联军进犯京、津之时，张翼就曾将开平煤矿的产权偷卖给英国，名义上是“加入各国商股”，改为“中外合办”，实际上则完全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严复虽身为总办，其实则事事受制于英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可见，让他主持开平矿务局事宜，事实上只是让他拥有一个虚名而已。

1902年，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总教习。严复终生将吴汝纶视为第一知己，认为他既湛旧学，又乐闯新知，因此，每有著译脱稿，都先请吴汝纶过目，以提出意见。吴汝纶对严复也十分佩服，故而在出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之后，即聘严复为该学堂编译局的总办，以主持翻译事宜。然而，吴汝纶在到职不久就去世了，严复感到“伯牙死而锺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因此，1904年，他便辞去了翻译局的总办之职，回到了上海。

严复回到上海之后不久，张翼为开平矿务局的诉讼交涉事宜，请严复同去英国。当时，正在海外宣传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也自美国来到英国。听说严复住在伦敦，便前往拜访。言谈之间，孙中山向严复介绍了自己的革命主张，但严复表示自己不能同意，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混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日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矣，”明确表示反对进行社会革命。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对他表示出很大的尊敬，并告诉严复：“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对严复长期以来出色的理论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由于严复在英国与张翼意见不合，因此在1905年，他就提前回国了。当他自英国回到上海后，马相伯正在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马相伯

此举，与严复长期以来的“教育救国”主张，十分吻合，故而，他极力协助马相伯的各项工作。1906，马相伯去了日本，严复接替他，做了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但只有几个月便辞职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安徽巡抚恩铭聘他为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但不久又离了职。

1908年，清政府的学部官员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自此至辛亥革命发生的3年间，严复一直在此供职。1910年，清政府施行“新政”，设立“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身份，被征为资政院议员。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间，严复虽然担任了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讲，他都没有尽心为之。在这10多年间，他用力最深、用功最勤的还是他的翻译事业。早在《天演论》出版一年后，他就认为：“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30年中无人为此者。”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看来，就西文的水平和对西学真谛的明了这一点讲，30年以内，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自白，并非傲慢自大的妄语。

严复知道，从事翻译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辛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但是，他又为什么要如此专心致志地从事于翻译呢？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这一点：“复自客秋（即戊戌政变时）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羈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也就是说，他之所以长期不辞劳苦，从事翻译，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的“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从而使“炎黄种类”发奋自励，使中华民族“得有复苏之一日”。忧国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他翻译出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权己界权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译文和按语合计约170多万字。这些译著与此前翻译的《天演论》一起，被后人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它们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建设，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严复，在其总体的思想上，虽然还保持着前期思想的发展格局，但是，却已开始了明显的保守和退步。他改变了以前民主与西学并重的主张，转而开始具有先谈西学、后谈民主，先谈教育、后谈政治的倾向。具体说来，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教育救国”论。前面已经谈到，严复在英国与孙中山见面时，就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革命，认为“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他也多次表示：戊戌政变之后，他“但觉一无可为”，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从教育的角度，来从事“愈愚”的工作。在1902年《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他更是系统地提出这一主张。他说：“今中国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其贫，起其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今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虽手茧足以求之。”

他之所以从事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也正是为了贯彻这一“愈愚”的中心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此前强调政治制度是由教育决定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经济上的民主思想。在严复这一时期的译著中，《原富》出版得最早。该书的译稿，一半成于戊戌变法之前，一半成于1900年年底以前。所以，在《原富》一书的有关按语中，其思想还是进步而又向上的，与此前的思想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部译作的字里行间，他通过自己的按语，竭力反对清政府的官办工商业政策，认为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他看来，亚当·斯密在《原富》一书中主要阐述的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定律。谁违反了它，必将一败涂地。他说，他之所以要翻译这本著作，就是由于“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家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所以，他在《原富》的按语中，总是反复强调，政府决不能干预经济发展，主张听民自为，主张实行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

严复认为，国家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名曰辅之，实以锢之，名曰抚之，实以苦之。生于其政，害于其事，此五洲国史，可遍征而知其然也”，所以“凡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音特谨其无扰足矣”。在后来批点《庄子》一书时，他还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听民自便”的思想。他说：“凡国，不论其为君主，为民主，其主治行政者，即帝王也；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得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在中国近代外有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内有封建制度残剥的双重压迫下，严复这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办政策，主张民间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商业的呼声，应该说是十分进步的。

九、保守颓废的晚年

严复埋头于西学著作的翻译之时，也正是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涨之日。面对日益高潮的革命形势，他始则不满，继则公开反对，从而由一个思想理论界的巨人而沦为落后保守的人物。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日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同盟会，并与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就革命还保皇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此时的严复，虽然不赞同康有为等人的立宪主张，但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则更是反对。他认为，不论是立宪，还是革命，都“为吾国前途之害”，认为这两派“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在他看来，“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正由于“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也”。他的所谓“公例通理”，就是指先搞好教育，开发民智，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严复对革命派的攻击也日趋激烈。1904年，他翻译的《社会通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本书的有关按语中，他根据原作者甄克思的庸俗进化论学说，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划分成“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个阶段。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属于“宗法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因此，“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秀桀之民所言议思维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因此，他认为，革命派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这种宗法社会的反映，根本不是什么科学的思想。后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章太炎，曾著有《社会通论 商兑》一文，对严复的这一思想，予以猛烈的批判。

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为了达到帝制的目的，袁世凯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另一方面又唆使那些反动政客，组织“筹安会”，为其恢复帝制，煽风点火。在这场闹剧中，严复也积极参加，并成为“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一。

关于严复参加“筹安会”之事，他本人及其弟子，后来曾多有开脱之辞，说他之所参加，完全是被动的，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严复在没有参加“筹安会”之前，在思想上早已是一个封建复辟论者。辛亥革命后，在民国刚刚建立时，他便明确地反对共和政治，认为中国必将重归于封建帝制，说什么“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言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直可忧耳”。1914年，他更是在《庸言报》上发表《民约平议》，批驳他早年曾十分推崇的洛克和卢梭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现在一线之机，存于复辟”。从这种复辟论开始，进而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这个所谓的“应运之才”登上皇帝宝座而煽风点火，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说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对于严复来讲，是出于被动的不得已之举，那么，稍后从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否定自己长期以来所倡导的西学，主张用传统的封建旧学来救中国，则是完全出于主动。1913年，在袁世凯称帝的高潮中，成立了孔教会，《庸言报》发表了《孔教会序》，发起者200余人，而以严复为首领。同年，他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大肆鼓吹尊孔读经。稍后，在他撰写的《导扬中华民国

立国精神》一文中，更是竭力提倡封建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反对他此前一再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更是对自己此前大力倡导的西学，进行全面的否定。他认为，西方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的 300 多年历史，“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因此，拯救中国的良方，只能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又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曾在《辟韩》一文中，痛斥韩愈以封建的道德继承人自居，但是，此时的严复，则俨然成了韩愈的知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严复更是以一个封建守旧派的人物出现，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对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主张，十分反感，认为“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对于胡适等人提出的白话文改革，也是不遗余力地反对，认为“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其柄，则亦如春鸟秋鸣，听其自鸣自止可也”。

1919 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发生后，严复也是横加指责。他说：“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又说：“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针对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他认为，“人虽良士，亦……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可见其顽固、保守已到了何等的程度！

1921 年，严复在他的老家病逝。

从严复的一生来看，他自己早期政治实践与学说思想的矛盾以及后期与前期的矛盾，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在近代中国，要想使国家独立、强盛，完全靠西学是行不通的，完全靠传统文化来救中国，也同样行不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严复个人的悲剧，正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悲剧。

